

新闻研究 资料

- 
- 
- 在白区新闻战线上 陈翰伯
 - 抗日战争中的《大众日报》 朱 民
 - 纪念严独鹤先生 陆 诒等
 - 上海“岛孤”抗日报刊述评 黄 瑚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三十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九月

责任编辑：阎焯书

封面设计：赵乃义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三十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190·029 定价：1.10元

ISBN7·5004·0104·3/G·2

目 录

回 忆 录

在白区新闻战线上

.....陈翰伯口述 高崧 胡邦秀整理(1)

地方报史选载

抗日战争中的《大众日报》

《大众日报五十年》第一章节录.....朱 民(21)

新闻界人物

试论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谢国明(49)

忆严独鹤先生.....陆 诒(65)

严独鹤与《新闻报》副刊.....郁惟刚 俞松年(69)

亲人们的怀念.....严汝英、严擷华、严祖祺、严汝珍、

严擷藻、严祖初、严祖祐、严建平(76)

怀念赵西同志.....蒋曙晨(88)

记林白水的女儿林慰君.....方汉奇(92)

学习与研究

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黄 瑜(95)

考证·补遗

中国第一份中文日报考

——关于《香港船头货价纸》与《香港中外新报》

……………(新加坡)卓南生著 张国良译(131)

武汉《汉报》考……………李 慕(146)

附录：说报……………(151)

新闻史料

李达与我党早期新闻出版事业……………唐春元(154)

瞿秋白主编的《布尔什维克》……………朱敏彦(162)

邓子恢与《岩声》……………周美颖 郭厚全(169)

《红色中华》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王美芝(174)

贝特兰与“西安事变”……………张文琳(183)

《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汇报》……………葛伯熙(190)

我国最早的化学期刊——《亚泉杂志》……………谢振声(197)

中国新闻事业史报刊资料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202)

· 回忆录 ·

在白区新闻战线上

(1936—1948)

陈翰伯口述 高崧 胡邦秀整理

一、西安两报

(一) 初到西安的喜悦

1936年夏天，我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做了一段短时间的全国学联筹备工作。由于我在上海没有社会职业，秘密工作没有掩护很难进行下去，生活也不好办，因此，就在这年的秋天，又从上海回到了天津家里。10月间，我接到燕京同学张兆麟从西安的来信，约我到西安去参加报馆工作。我非常高兴，立刻从天津经过北平来到了西安。

到西安那天是11月28日，第二天我就到西京民报社上班工作了。初到一个地方，先要熟悉一下环境。我很快发现这里的政治气氛很活跃，谈论抗日、民主是比较自由的，不象在北平被压抑着。《西京民报》是张学良将军办的报纸，和我们往来的，大部分是东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特别是其中的学兵，多半是从北平来的，被编在东北军的学兵队里，驻在西安东城门楼上。这些从北平来的学生兵，和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家在一起回忆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更多的话题是谈论当时西安的局势。我了解到，当时陕北红

军和东北军早已停战，和西北军的十七路军也停了战，甚至红军需要的药品和被服，东北军也帮助用卡车运送过去。听说两边官兵还开过前线联欢会；又听说东北军有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去了以后，大约一个多月后又放了回来，这些事在东北军里几乎人人皆知。

一年前，我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现在，又来到这样一个环境，听到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心情非常兴奋。我觉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扩大多了，有可能发动上层，争取上层来参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斗争。

记得有一天下午，忽然听说红军开到西安南郊了。也不知是什么人，更是绘声绘影地说红军已经到了大雁塔、小雁塔了。我们立刻派了两个记者去采访。当然，红军在这时决不会开到西安来，这只是人们一种幻想式的希望。

当时，蒋介石从洛阳坐镇到西安，军队也往这边调遣。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想在陕西、甘肃一带一举消灭红军。这些动向，我们也都知道，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总的说来，我到西安以后，叫人高兴的事多，心情喜悦。偶而也听到一些不怎么叫人愉快的事，比如：在哪里哪里，东北人和陕西老乡吵架斗殴了，部队之间也发生过一些小冲突，……不过，这都不是政治性的。

从上层来说，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是团结的，就是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互相团结的。蒋介石到西安后，我们知道两位将军一起向蒋恳切陈词，苦心进谏，无奈蒋介石就是不听。在12月9日那天，我们在报上发了一篇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社论，很受学生们和知识界的欢迎。那天，西安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城万人空巷，拥上街

头，很有声势。我们除了报道消息，又及时提出“拥护张副总司令领导我们抗日”的口号。张学良当时是副总司令。

十年动乱中，对我“专政”的造反派头头问我：“你们为什么拥护张学良来领导抗日？”我说：“在这以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学良的政治态度，他是要抗日的。作为东北军的主帅，他要打回老家去；他要求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答应。张学良要抗日，我们就拥护。当时，我处在那样的环境，能在报上直言不讳地要求红军领导抗日吗？”

再说12月9日这一天，西安学生游行到下午，队伍向临潼行进。蒋介石就住在临潼华清池，学生要当面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大怒，声言有敢来临潼游行的，格杀勿论。张学良在临潼闻讯，立即赶到坝桥，劝阻学生。他劝学生勿作无谓牺牲，说他正向委员长请谏抗日，三天之内，必向大家答复。张学良的讲话，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为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接受了他的劝告，返回西安。

我在报馆，随时等候采访记者的消息。获悉张学良对学生的讲话后，我在忖度三天以后张学良会作出怎样的答复？心里估算东北军可能要有所举动了。

（二）枪声传来的欢腾

说着说着到了12月12日。我来报社十多天，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看大样。这天也和平日一样，看好大样，我们做夜班的吃点东西要去睡觉了。炉子上热着雪里红炒肉丝，发出吱吱声，几片烤焦的馒头片，满屋散发着香味。我一手拿着馒头片，一手拿着大样往排字房去，走过院子时，突然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这时刚六点过一点儿，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在那儿瞎猜，猜来猜去，我们先是断定，准是红军进城了；转而又猜想，会不会是中央军动手了，动手解除东北军的武装？再不然会不会是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闹磨擦了？……做了种种猜测，莫衷一是。前几天我虽然有所猜度，这时却没有讲出口来。大家忙了一夜，已经相当疲倦，又猜不出个名堂，于是吃完了馒头夹雪里红就去睡觉了。

大约十点来钟，有人从外边来告诉我：“今天早上，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提出了解决国是的八项主张。”我高兴得一跃而起，马上想到赶紧发个号外，把这特大喜讯报道出去。当天的报纸，中央社的电讯我们一条也没有用。但是，刊登的我们自己采访的新闻也已经成了明日黄花，让它报废算了。出号外是很方便的。我们立即动手写稿子，排成十六开一版，不一会就印出来了。这时，上白天班的人都来了，我跟大家一起拿上号外分头跑到大街上叫卖。起先还是几个铜板一张，后来就干脆不要钱在大街上散发起来了。顷刻之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遍全国，传向世界，而最早作出报道的，就是我们《西京民报》这张号外哩！

卖报归来，我们办公桌上摆满了酒瓶子。大家都来痛饮庆贺，真是座上客常满，瓶中酒皆空。这一天，全西安城都沸腾了。

午后，我在宿舍里怎么也呆不住了，走到大街上去观光，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最激动人心的标语是：“组织人民法庭，公审蒋介石！”当然，这个口号不是共产党的主张，而是群众自发的愿望。

当时国民党在西安也有一张报纸，叫《西京日报》。它还照旧刊登中央社的消息，竟说张杨是叛乱，这当然令人不能容忍，张学良将军下令没收，并立即派了东北军的秘书郭维城（我党党员，解放后任铁道部部长）组织一个班子去接管，我们《西京民报》的张兆麟也被抽调去了。接管工作非常顺利，12月14日就又出报了，更名为《解放日报》。大家都知道，后来在延安有一张《解放日报》，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后，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也叫《解放日报》，但是中国的第一张命名《解放日报》的，是当时西安的这张报纸。

国民党在西安办的“官报”——《西京日报》，就这样被我们的人接收过来了。张兆麟去《解放日报》以后，《西京民报》的总编辑就由我来担任。

大约在12月15日或16日，上级党组织派了一位同志来我们这里建立支部，这位同志名叫宋黎，是东大的学生，当时在张学良将军公馆里当秘书。支部成员有我，还有一位副刊编辑魏恩民，他现在的名字叫魏文伯，做过华东局书记和司法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报社经理，名叫段兢。此外还有一位，似乎是王昭，他不是报社的，在东北军里当秘书，因为他那儿没有建立支部，也编在我们支部里。我被指定任支部书记。组织上常常派人来给我们讲解形势，办报的方针则由我们自己商量决定。支部里几个人都认为按照张、杨的八项主张来宣传为宜，不讲过头的言论，也不以党报口气说话，在群众中还是以张、杨的立场出现。

西安事变以后，群众运动完全开放了。这方面的活动我们报纸上报道得很多很多。

我在报馆，全部力量都放在这张报上，不参加任何社会

活动，这样好保证这块阵地不出乱子。报纸是四开一小张，主要是掌握第一版的国内新闻，其余三个版上的国际新闻、本市新闻和副刊都比较好办。不管哪个版面上，南京发的东西我们一字不登。

蒋介石回南京后，违背诺言，倒过来把张学良扣起来。这时东北军中思想十分混乱。到了第二年，即1937年的2月2日，有些少壮派提出不惜武力解决，营救张学良，王以哲将军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少壮派竟把他打死了。那天我正准备外出去看电影，忽然听见枪声，事后才知道王以哲将军被杀害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被东调安徽，蒋介石派蒋鼎文的部队开进西安。

又要谈到我的“专政者”了。在他盘查我这段历史时，当我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的神经立刻受到触动，在他看来，什么和平解决，和平就是修正主义嘛！我想对他讲解，可是又觉得我没有义务给他上课，他也未必听得进我的课。最后，我想，我给他留点“作业”吧，我建议他：“你还是把毛主席的著作好好看看，把西安事变的历史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和平解决。这是中共中央的主张。不是我的主张。要不然，国民党就要继续‘剿共’，内战不但不能停止，而且规模还要扩大。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的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东北军调走了，我们的报纸也就此停刊。

（三）宣侠父被绑架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西京民报》就停刊了。我立刻成了一个“待业青年”。但没“待”几天，西北文化日报

社的社长宋绮云（党员，长期给杨虎城将军办报，一直追随杨虎城将军，解放前夕，一起牺牲在渣滓洞）来找我，约我到《西北文化日报》去编副刊，我马上就同意了。编副刊不需夜间上班，白天看看稿子，编一编，用不了多少时间，一天的工作就完成了。

报社夜班有个编辑叫张省吾，他负责国际新闻版，曾在天津《大公报》干过好几年，可以说是个老编辑，不料在工作中竟出了问题。当时西班牙有内战，法西斯头目、长枪党首领弗朗哥发动叛变，包围民主阵线的政府，战争持续不断。张省吾在编报时加了一个标题：“西班牙斗牛何时已”。这一下糟了，第二天，市井哗然，电话不断，读者纷纷来质问：“怎么回事，你们那儿什么人人在管编报？”这时，宋绮云随杨虎城将军出国了，换了一个社长叫李子健。李子健只好把张省吾辞退了。

报社的夜班工作是桩苦差事，张省吾去后，一时找不到合适而又愿意干的人，我想多占一个阵地，可以多发挥点作用，就自告奋勇说：“我来！”于是，国际新闻版的工作就由我揽过来了。

报社还有一位主笔叫张从仁（党员，已故）。主笔是管言论的，每天要写一篇社论。大约在“七七”事变前的一天，他晚上要去参加交际活动，不能赶回来写稿，就委托我代替他。以后，他一有事就要我代替，慢慢的，他索性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这时，我的责任就重了。组织上并不指定我写什么，只是随时来讲讲形势，由我自己决定社论内容。

这样，我在《西北文化日报》就把副刊、国际新闻和社论都管了起来，不过，我始终没有一个职衔，我自己印的名

片上还是“西北文化日报记者”。当时，报社的社长也不大管编辑部的事，每天按部就班出报就是了。

“七七”事变后，好消息不断传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在西安的办事处公开活动了（红军办事处在西安事变时就有，这时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还是找机会就跟八路军闹摩擦，偷袭八路军，并且对八路军不发饷、不给弹药补充……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从没有中断过。这里说说八路军一位参议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事情。

这位参议的大名叫宣侠父，浙江诸暨人，他跟徐向前、胡宗南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长期在广西部队里工作，大概当过师长，这时在八路军办事处任参议。有一天张从仁带我到宣侠父家里作客，我在这家的小客厅坐下来，看见满墙挂的都是广西一些要人的书法和山水画。他家的地址叫通济坊，就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对面，近在咫尺。一天，他从家里到办事处去办公，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就失踪了。

这件事立刻在社会上传开来，人们都意识到准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勾当。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他们根本不理。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篇新闻稿揭露这件事，他们把稿子送到我们报社来，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有新闻检查，这条新闻肯定要被他们扣掉，是登不出来的。”新闻没法登，我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登一个寻人广告，因为广告是不检查的。我把新闻稿改成广告，附一张照片，把宣侠父的相貌、特点，作一些扼要的描绘。寻人广告是登出来了，但是国民党方面还是不予理睬。

宣侠父突然失踪的消息，在西安很快家喻户晓，只是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这些人虽在新闻界，也不知底蕴。

前不久，也就是这件事发生了半个世纪之后，我偶而翻阅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我这三十年》，其中提到宣侠父被绑架的事。他说，是他们军统的人把宣侠父捉了去，丢在一口枯井里，把人活埋在里面了。

当时，我们党为宣侠父失踪的事跟国民党几经交涉，听说蒋介石说：“他是军校的毕业生，这是我们对执行纪律，不要你们管。”就是说共产党管不着，真是岂有此理！

这以后，国民党镇压群众运动的事屡有发生。

从宣侠父被绑架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想把西安变成一个反共的、阻止进步同志到延安去的堡垒。

西安，处在反动恐怖的氛围中。

（四）访问西禹门口

日寇占领太原后，很快就沿同蒲线南下，直到占领风陵渡，人们担心日军有在风陵渡过河的可能，西安当然紧张起来了。人们密切注视日军的动向。这时，我向社长提出来要到前方去采访，他答应了。于是我拿着李子健的介绍信，到了渭南北边的郃阳，再往东到了韩城。韩城在黄河西岸的河边上。我到韩城后，先到驻军孔从周师部，见到师长孔从周（孔是我党地下党员，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正在和几个部下作牌戏，我这个客人来了，他寒暄了一阵，就让我在桌子旁边看他们打麻将，还诙谐地给我介绍他的牌友：“这是我们炮团的团长，我们是步炮协同……”等他们打完了麻将，我才说起此行的目的，我对他们说：“我想过

河，去作战地采访。”孔师长说：“不行，河东已经沦陷，我要保证你的安全，你得听我的。我这个部队奉命就是守陕西河西这条防线，你只能在河西转转。”过河采访不行了，我又提出来，要到西禹门口看看，他答应了。

第二天，孔师长派了个团长（名字已忘）陪我到黄河边上，团长给我备了匹马，我就骑上马跟着团长向东走去。我从来没有骑过马，一上去驾驭不了它，马跑快了，我就拼命喊：“吁，吁，……”想让马停下来，可是，团长从后边跑过来，照着马屁股啪啪两鞭子，马又撒开腿朝前奔了。这马背上的60华里路，可真要我的命了。

到了禹门口一看，西禹门口只有一座早就坍塌了的小庙。这里，河岸是平坦的，水流也很缓慢，渡河是很方便的。风陵渡那边水流就很湍急了。这时，敌人已到了东禹门口，那里也有一座庙，我用望远镜可以看见日军在那座庙里走来走去。团长判断说：“敌人没有渡河的迹象。”他是军人，他当然会判断。

看了一会，我们就回来了，于是上马复向西行，团长还向我介绍说，韩城有司马迁的墓，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可以去看一看。可是，我驭马的本领实在太不行了，绕道去看司马迁墓又得多走一个多钟头，就径直回韩城了。回来的路上，河东的日军向我们这边开炮，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落下来又猛烈爆炸。那几天，敌人天天打炮，不过团长还是镇静地说：“不要紧的，他们没有渡河意图，要是渡河，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回到师部又住了几天。由于这个部队的任务是守河西的，敌人在河东，双方还没有交战，所以我也没有战地新闻

可写，只好又回报社。

这趟韩城之行总算做了一次战地记者，遗憾的是没有写出东西来。

二、陪斯诺夫人访问延安

抗战初期，有一本流传很广泛的书，叫《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他的第一个夫人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在燕大念书时，常在斯诺家作客，他们帮助我们做了一些“一二·九”运动的预备工作，跟他们夫妇俩都很熟悉。

1937年4月，我在西安接到北平来的电报，说是海伦·福斯特·斯诺要到西安来。我按照电报通知的时间去车站接她，可是没有接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纳闷。第二天，我到西安唯一的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西京招待所去探询，原来她已经在那里住下了。她告诉我，出发之前，和西安这边已经联系好，所以一下子就来了。她还悄悄对我说：“我要去斯诺先生去过的那个地方。”这就是说，她要到延安去。事实上，她已经和党接上头，行动计划也有了，就是有一个难关不容易通得过：她怎么走得出现西安城呢？首先是怎么走得出现这个招待所呢？

我绞尽脑汁想主意。谁知，我的主意还没有想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又加了码。第二天，我到西京招待所去看海伦，我们正在屋里谈话，进来一个人，自称是警察局的什么科长，他对海伦说：“我们知道你来了，我是奉命来保护你的。你不能离开西安城，因为西安城外很不安全。你在城

内，我们负责保护你的安全。”我一听，糟了，掉进他们网里去了。

我和海伦面面相觑，无可奈何，海伦只得听候我方的通知。在等待的日子里，我陪同海伦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名胜，诸如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和华清池等地都去转了一转。那位警察局的科长每次都跟着我们，俨然是我们的警卫员。

有一次，我们从西京招待所坐黄包车到阿房宫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科长也上了一辆车子紧跟着来了。到了那儿，我还得替他付车费，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一块进去看电影，心里真厌恶透了。试想，一个特务坐在自己身边，这部电影怎么好看也看不下去，什么艺术享受、美的享受，统统跑到爪哇国去了，一心想着用什么办法把这家伙甩开。直到电影完了，我也不知道演的是什么，但我终于想出一个点子。

过了一天，我又到西京招待所去，当着特务的面，对海伦说：“我要到咸阳一带去采访，这几天不能来陪你了，有什么事你自己办吧。”我的身份是西京民报记者，到外地采访是很平常的事。

我又把我对海伦说的话，原原本本翻译给特务听，就是让他知道，你不是监视我们行动吗？不让我们出西安城吗？现在，我去干我的工作去了，海伦的行动我不管了，看你怎么办。这以后有一两天，我足不出户，以为已经把那个特务甩掉了，就拿起电话，想和西京招待所的海伦联系。电话接通后，对方一开口，我的心扑通一下，哎呀，糟了，接电话的正是那位特务科长。当然，他会立刻想到，原来这个记者并没有去采访，也没有离开西安。我赶紧把电话放下，感到这件事弄巧成拙了，于是就躲到西安二中一个叫张丕仁的语